

读书
治学
做人

学问人生

学问人生续 [下]

——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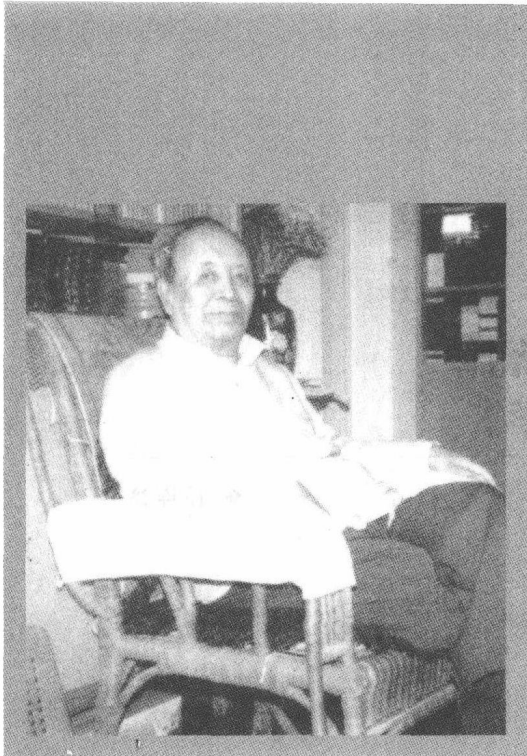


学问人生

学问人生续 [下]
—— 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毛 星

■ 简 历

毛星（1919—2001），原名舒增才，四川德阳人。1937年10月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冬至1945年10月，先后担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指导员、总支委组织干事、组织部长。1946年5月赴东北，先后任佳木斯《合江日报》、哈尔滨《松江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等职。1949年12月起，先后担任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总编辑、东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副处长、文艺处处长。1954年9月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同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党的领导小组副组长、《文学评论》副主编、研究员。1978年起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离休。

■ 主要著述

《论文学艺术的特性》、《胡风文学思想批判》，主编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

毛星先生主编大型著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 祁连休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蔚为大观，让我国文学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界无比欢欣鼓舞。而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这种欣欣向荣局面的出现，跟毛星先生的努力和贡献密不可分。

1979 年 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昆明主持召开了第三次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学者和负责人聚集一堂，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共同商讨重新恢复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各种重大问题，进一步修订和落实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计划。在这一次会上，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编撰一部包括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填补空白，并且有力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立即组成由毛星先生挂帅、民间文学室多数研究人员参加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辑组。经过反复斟酌与协商，确定了全国各地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撰稿人，并且着手进行调查、采集和编撰工作。

当各少数民族文学概况的初稿陆续交来以后，毛星先生亲自逐一审阅，同时集中编辑组全体成员进行编辑加工，分期分批地进行调整、压缩、删削等工作。自 1980 年秋至 1981 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派编辑组全体成员带着修改稿去东北、西北、云贵川、两广、福建等地，向各地学界和主管部门，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专家、学者征求意见。最后在毛星先生的指导下，于 1981 年夏统一定稿，并且由毛星先生撰写每编的“导言”和





全书的《序》。历时两载有余，一部具有首创意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终于大功告成。1983年7月，此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分上、中、下三册，共计150余万字，是一部系统展示中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就的集体著作，按照毛星先生的构思，主要突出全面性与介绍性两个特点。

该书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全面性。全书不但全面展示我国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成就，而且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成就，又包含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两大部分，只有那些千百年来一直以口头形态从事文学创作的民族例外。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均源远流长，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以藏族文学概况为例，共分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文学、传记文学、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民间戏剧、民歌、民间叙事诗与颂歌、作家诗歌、文学理论等单元。第二类，兼有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而以民间文学为主体，如苗族、壮族、彝族、满族、傣族、白族、土家族、柯尔克孜族、纳西族、锡伯族。以彝族文学概况为例，共分为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抒情诗、民间叙事诗、民歌、谚语与谚语诗、当代文学等单元。第三类，只有民间文学而不涉及作家文学，如傈僳族、佤族、黎族、鄂伦春族、撒拉族、赫哲族、仫佬族、珞巴族、基诺族。以佤族文学概况为例，共分神话和传说、史诗和叙事诗、民歌、民间故事等单元。



1949年毛星在沈阳

该书的第二个突出的特点是介绍性。

这种介绍性绝不意味着降低全书的要求和水平，恰好相反，是主编毛星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独具慧眼的正确抉择，正像他在《序》中所阐述的那样：“这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不是历史，不是理论，不是批评，也不是评介，我们只抓了个‘介’字。我们想使读这部书的读者，能更多地更具体地接触、感



受、了解各族光华四溢的文学创作成就，因而我们定下了一条方针：突出作品。办法是：最精彩的短小的作品，列举全文，一般则介绍梗概，列举精彩的片段。……为此，原稿中一些分析、评论和考证，虽然是科学的，以甚至是精彩的，我们也大都割爱，删除了。我们认为，这并不抹杀执笔者们的科学努力，执笔者辛苦劳作所取得的科学质量依然存在：存在于那简短的说明，存在于对作品的选择、安排，梗概的概括、表述，精彩片断的选择，以及从梗概和列举的作品片断中所反映出来的翻译水平等等，只是分析、评论和考证以及理论上的见解，都隐含在看起来简短的介绍中罢了。”笔者以为，这样写书不但大大节省了篇幅，并且使之具有长远的保存价值。因为限于当时的学术水平和认识水平，对各少数民族文学所作的分析、评论和考证，都难以尽如人意。而用展示文学宝藏的方式来介绍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成就，非常有说服力，并且不会过时。

三

编撰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是一项十分艰巨繁难的任务，需要几代学人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从调查资料的积累、研究队伍的建设到学术水平的提高、写作成果的升华，绝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次努力，对于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都很有意义。在编撰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进程中，毛星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此书的出版，揭开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篇章。这部大型集体著作的启动，正处于新时期的开端。当时，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正面临一个重新恢复、重新建设的大好时机。它的编撰，有力地、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全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对于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而言，本书显然是一次极好的实战演练，从资料、队伍、经验诸多方面，为即将重新上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并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书的撰稿者达百人之众，其中过半数为少数民族的专家学者。这些少数民族专家学者，既有承担本民族文学概述撰稿的，譬如蒙古族的色道尔吉、哈萨克族的阿吾里汗·哈里、白族的李缙绪、瑶族的刘保元、壮族的陆里、满族的赵志辉、朝鲜族的权哲、布依族的杨路塔、锡伯族的忠录、撒拉族的马学义；又有承担其他民族文学概述的，如郝苏民（回族，撰写东乡族文学概述）、才让丹珍（藏族，撰写裕固族文学概述）、



苏晓星（彝族，撰写苗族文学概述）、左玉堂（彝族，撰写傈僳族文学概述）、燕宝（苗族，撰写水族文学概述）、杨秉礼（白族，撰写怒族文学概述）、杨文庆（白族，撰写普米族文学概述）。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百余位撰稿的专家学者，有不少成为日后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写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或担任主编、顾问，或担任撰稿人，在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工作中继续发挥作用，为少数民族文学史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譬如，藏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佟锦华是《藏族文学史》的主编兼撰稿人之一，蒙古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色道尔吉是《蒙古族文学史》的顾问兼撰稿人之一，苗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苏晓星是《苗族文学史》的作者，满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赵志辉是《满族文学史》的主编，傣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王松是《傣族文学史》的作者之一，瑶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刘保元是《瑶族文学史》的作者之一，羌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李明与林忠亮是《羌族文学史》的主编或撰稿人，彝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陶学良是《彝族文学史》的主编与撰稿人之一，傈僳族文学概述撰稿人左玉堂是《傈僳族文学简史》的作者，珞巴族文学概述撰稿人于乃昌是《珞巴族文学简史》的作者，布依族文学概述的一位撰稿人汛河是《布依族文学史》的撰稿人之一，赫哲族文学概述和鄂伦春族文学概述的撰稿人之一隋书今是《鄂伦春族文学史》的一位撰稿人。



1986年毛星在去汕头船上的留影

四

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毛星先生的主持下完成的。在两三年的时间内，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工程，从昆明会议后到各少数民族地区摸底，从回京后组建编辑组和制订编写方案到由他亲自撰写每编的导言和全书序言，以及在他的指导下统稿、定稿，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学概述，无不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为

了排除干扰，最大限度地集中精力搞好这个浩大的工程。他虽已年过六旬，竟从自己的家中移居到陶然亭公园东门内的小平房里，冬季靠生煤炉取暖，夏季需要忍受炎热与蚊虫叮咬，一年四季主要吃食堂，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他广泛阅读各种历史古籍和相关的著述、资料，全部审读了各地交来的数百万字的初稿，并且逐一提出修整意见，认真指导每个部分的调整、压缩、删削工作和最后的定稿工作，处处以身作则，用榜样的力量鼓舞和鞭策编辑组的全体成员，使大家精神饱满地踏实工作，确保这部集体著作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

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项颇具开拓性的民族建设工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那个时期运作，难度相当大，困难相当多。在组织和协调各地撰稿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方面尤为费力。毛星先生在主编这部

大型著作的过程中，知难而进，以巨大的热情和高度的智慧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最后的成功。譬如，维吾尔族历史悠久，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都十分丰富多彩，但长期以来有关的研究工作却比较薄弱。因此，本书撰写维吾尔族文学概述的任务就颇为艰难。毛星先生通过与新疆各有关机构及主管领导反复协商，最后才确定邀请通晓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阿不都秀库尔·图尔迪、艾尔西丁·塔特里克两位维吾尔族学者和刘发俊、张宏超两位当地的汉族学者撰稿。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通力合作，终于写出系统介绍各种体裁的民间文

西12月

捲地黄沙扑面，
此风呼啸多严寒。
虽将无气惹心恼，
路上人人感叹！

孤本无才持阻，
群林改造河山。
风平沙静挽新颜，
一轮红日再临。

1976.5.22



学和从古至今各个时期的作家文学的维吾尔族文学概述，为本书增色不少。又如，彝族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等省、自治区，地域辽阔、支系众多。其文学主体的民间文学既有共同的民族特色，不同聚居区又各具地域特色。除口头文学外，还有不少包括彝文（亦称“老彝文”）写本及其他手写本的写本文学。撰写彝族文学概述，不但要攻克各种学术上的难题，还要处理好来自不同省份的撰稿人——老专家与中年学者之间的关系。在编写过程中，毛星先生做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沟通、协调工作，善始善终，使彝族文学概述成为全书的一个亮点。再如，像门巴族、珞巴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一些兄弟民族，人口很少，居住地区比较分散，其文学状况几乎不为学界所了解。在编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时，毛星先生格外关注这些民族的撰稿工作。他采取各种办法，促使有关少数民族自治区组织人力，进行专门的调查、采录，从充分运用田野作业的资料入手，认真进行编撰工作，如期交稿，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方面填补了一个个的空白。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稿、审稿、改稿、定稿的全过程中，毛星先生在编辑组内再三强调，要充分尊重地方有关领导和学界同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文学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请地方上的学术界同仁为我们把关。正像他在《序》中讲的那样：“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编写者是各地各族的同志们，我们只不过是做了点组织工作，做了点最

毛星墨迹之一

天安门前的壮丽

天安门上两翼，
 天安门头人型立。
 天安门行千里浪，
 天安门山无角。
 人海如潮绝顶礼，
 南国情意只纸迹。
 万人同悲水事奇，
 万众一心思安危。
 天安门前五大桥，
 某晚灯下献行歌。
 国歌教鸟唱除魔性，
 国歌教头岂可移！
 国歌大厦折旗柱，
 国歌浩气干霄霓。
 国歌心经一角凉，
 国歌迎迎（国歌）。

1976年





后编定的工作。”编辑组的全体成员都按毛星先生的要求做了，不但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而且确保了全书的学术质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尚须着重提及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编撰，正值我国进入一个崭新历史阶段的开端，民间文学事业和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百废待兴，面临一个重振雄风、全面发展的时期。毛星先生通过主编这部著作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学科建设和带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的研究工作，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正确举措。因为民间文艺学的振兴，必须打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基础。不懂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就谈不上民间文学研究。在我国要在民间文艺学上有所建树，无论从事分科研究还是综合性的理论研究，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毛星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而且对于编辑组成员（他们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学术积累和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室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的20多年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辑组成员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取得的成就，包括在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各分支学科内的专门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史》的编纂、《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论丛书》的编审、各民族文化史研究等等，无不从中受益，并且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扎实，更有造诣。

（本文作者祁连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难忘的往事

——回忆敬爱的毛星同志

◆ 吴庚舜

人生往往会遇到这样的事：有的人，人们先闻其名，后识其人。如果这人徒具虚名，人们在失望之余，就渐渐淡忘了；而有的人，却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令人永远难忘。毛星同志就属于后者。

第一次见到“毛星”二字是在读《文学研究》（后改名《文学评论》）的时候。记得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那几年，同学们课外常读的文学刊物有《人民文学》、《译文》、《文艺报》；常读的学术刊物《文学研究》（包括它的集刊）、《光明日报》上的《文学遗产》和《文史哲》等。

《文学研究》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它的编委会成员阵容强大，有各个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指导我论文的林如稷教授即是编委之一。他是活跃在“五四”运动后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的成员，曾留学法国与冯至、陈翔鹤、杨晦、陈炜谟等人，始终保持着友谊。他知识渊博，对文坛的历史、现状了如指掌。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我：青年人读书面要宽广，扩大眼界，但也要作选择，不要浪费时光。谈到刊物，他向我推荐《文学研究》，说它办得很有特色，思想活跃，内容包括古今中外，其中好的文章能予人以启迪，并说这个刊物的主编、副主编何其芳、毛星有眼光、有魄力。

其芳同志的诗歌、散文、论文，我读得比较多。毛星同志的文章，林老师提到他之前，我只读过他的《关于李煜的词》（载《文学研究集刊》1956年）。李煜是我喜爱的词人，他的好些作品教人回味无穷，觉得很美。有的句子，如“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几乎令人过目成诵。说句老实话，李煜词的好处究竟在哪里，从前我没有研究，当然说不清楚。最初就相信文学史说的，曾以为它就是空论了。接着看到报刊的热烈讨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知如何是好。



看了毛星同志的文章，被它引人入胜的问题所吸引，被它细致说理所折服。文章有分寸地指出李煜词中存在的问题，但同时又说“李煜的词将因它的艺术描绘方面的成就成为民族的宝贵遗产，长久获得保存，长久供给人们美的享受”。这和那些简单化的、片面性的文章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1959年9月15日，我从四川大学到了文学研究所。两个星期后，全所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六号楼三层大会议室举行国庆十周年联欢会，见到了景仰已久的毛星同志和老一辈学者。毛星同志中等个儿，衣着简朴，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第一印象。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接近的时候并不多。一些有关他的“传奇故事”都是摆龙门阵时从来所早的同志那里听到的。他们说抗日战争刚开始，为了救国，十七八岁的毛星同志就毅然奔赴延安了。他在鲁艺学习工作过；又说他在解放战争中到了东北，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曾任东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有的同志还说，他到文学研究所不久，中国科学院正式任命他为文学所副所长，被他坚辞了。他到所时看到自己的工资比何其芳同志高，便主动要求降一级，隔了不久又自己再降一级，而他家人口多，负担重，生活并不宽绰。这样一位淡泊名利的领导，实在令人钦佩。他在科研上和唐棣华同志在行政上竭尽全力协助其芳同志工作，为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为文学所的建设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们从未听说他们之间为个人私利而发生矛盾。上梁正，下梁不歪，是他们带出了文学所的优良传统。

其芳同志爱才如命，知人善任，他让毛星同志独当一面，负责《文学研究》的工作。毛星同志善于调动研究界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坚持“双百”方针，刊物办得生气勃勃。我曾列席一次所里的会议，讨论办刊方针。会前发的一份文件说，刊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贯彻“双百”方针，提倡以马列主义观点而写的论文，但同时也发表有文献价值、能自圆其说的学术论文。我当时因刚出大学不久，思想还比较简单幼稚，觉得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应当人人都运用它来指导写作，不必有什么例外。我的思想成熟以后，才知道《文学研究》的方针是对的。它对一些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老专家也可以发挥他们之所长，使他们在学术研究上能有用武之地。譬如孙楷第先生擅长考证，他的小说、散曲方面的考证文章，就很有价值。《文学研究》不仅在国内赢得读者的青睐，在国外也受到赞誉。“文化大革命”后，钱钟书先生访欧归来告诉我，国外一名校的教授对他说，《文学评论》（改名后的刊名）是他们学校必订之刊物，有一个时期方针变化，没有古典文学方面的文章，他们就不订了。于此也反证了原来办刊方针的正确性。



除了办《文学研究》，毛星同志对其他所里的重大科研项目也付出了心血。譬如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应时代和社会需要而撰写的一部文学史著作，曾长期作为高校教材。去年，我去拜访贺敬之同志，他说这部书写得好，至今还放在他的案头。毛星同志在这部书的立项、策划、审订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毛星同志在《唐诗选》编写中所提的重要意见恐怕知道的人极少。《唐诗选》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已启动，“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停顿。工作前期，我因下乡参加运动，没有参加。1975年工作重新上马，余冠英先生找到我说：《唐诗选》要修订了，钱钟书先生因撰写《管锥编》不能参加，你来参加，兼作业务秘书，我答应了。没过两天，就在文学所二层西头朝北的古代组办公室开会，除编写组的全体成员，还邀请了毛星同志、张白山同志（当时古代组的负责人）。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最后确定根据《全唐诗》重订选目，发掘新的好诗，修改诗人小传，修改注释，核对引文、弄清古今的变化等等。

当时政治环境严酷，“四人帮”还在台上，“双百”方针已被他们蹂躏得惨不忍睹，他们下命令停止科研人员搞科研。禁令犹如一把邪恶之剑悬在我们的头上，“宣传封建主义”、“借古讽今”、“走资本主义道路”之类的帽子随时可能被扣上。大搞荒谬的“儒法斗争”。在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史无前例”的时代，搞科研存在着危险，所以关心我们的人，很为我们担忧。有的说：武则天被奉为“法家”，你们选写过《讨武氏檄》的骆宾王容易犯讳；有的说杜甫是“儒家”，你选了他很多诗，而李白入选的作品比他少，恐怕通不过。因而有的老先生悲观地说，辛辛苦苦搞出来，出版不了怎么办？余先生坚定地说，只要工作有意义，我们就搞我们的，不能出版就让它藏之名山好了。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大家遇到困难并不气馁。修订工作比想象的艰巨。选目的增删，不是从选本到选本，而是要通读五万多首《全唐诗》，从里面再选好诗；新撰小传和修订小传也颇费工夫，既要利用前代文献，又要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注释强调不避难点，别人不注而必须注的，往往花许多时间也在所不惜；地名古今之变，用《古今地名大辞典》等解决不了的，还借助直接和间接的实地考察来解决。毛星同志很赞赏这项工作，他在看了新选目和一些选注稿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

此稿匆匆翻过一遍，随翻随记下一点意见，搞断代诗选，要着重考虑一个“代”字，总的说来，要实现这个时代、国家、人民生活及诗歌创作（特别是唐代）的面貌。政治标准如说明所讲的那段话，立脚点应



是劳动人民立场，而不是单单一个“法家”的角度（对“法家”也应用毛主席那段话衡量）。比如对战争，就不能只是歌颂，也要考虑当时人民群众所感受的征戍之苦，等等。又如选不选《高昌童谣》问题，对唐太宗征高昌怎么看呢？除了要考虑民族问题，即算是百分之百的正义吧，把唐兵比作“日月”（按：原作语），也未免过分了。我很怀疑这首童谣是否真是高昌劳动人民创作的。而且，用这首童谣作开卷第一篇是否好呢？如以魏征的《述怀》作开篇，又与沈德潜《唐诗别裁》以及有的《唐诗选》一致了，该怎么办呢？诗选稿上的意见和上面讲的，都是未仔细考虑的……请你一个人翻翻，就不要传给别的人看了。

当时毛星同志受打击尚未解放，他叮嘱“不足与外人道”，怕牵连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但他主张不用“法家”画线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另外，他对《高昌童谣》的见解，虽然是用怀疑口吻提出，可不主张入选的态度却很明显。他提出慎重对待民族问题，人民的感情问题，给我的启发很深。我单独和余先生见面时，口头转达了他的意见。我们《唐诗选》编写组的成员思想一致，都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作家、作品，不跟错误思潮走，所以新订选目受到一致好评。其芳同志和冯至、蔡仪、唐弢同志以及学部外的缪钺等诸先生都感到满意。唐弢同志建议增选一些长诗。钱钟书先生的意见尤有代表性。下面是他致编写组全体成员的信：

灌婴先生并转琴翁、象、庚二妙同鉴：

增选目已一一校对原诗，鄙见五纸附呈，陶诗所谓“所言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也。杜、韩、三李等大家篇什，加添者皆允惬，无可议，足征衡鉴之公明，甚佩。

经过近两年的辛勤耕耘，这部诗选于1977年4月正式出版后，在中外读者中反响强烈，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买书的长龙。它至今仍是唐诗最好的选本。

自谈唐诗后，我和毛星同志谈心的时候多了，他生病以后，我们夫妇和其他朋友常到他家去看望他和经琪同志，大家无拘无束，感到文学所的人情味、优良传统、学术气氛又重新回来了。毛星同志学识渊博，在文艺界的阅历丰富，思想深刻。我们的话题除古典文学外，也谈到其他艺术门类，包括绘画、电视、电影等。他说影视作品影响面广，一部好的作品往往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话语间流露出他对平庸作品的不满。他希望看到更多的好电视、好电影。一次，他谈到有关辛弃疾的影视作品，他觉得像辛弃疾这样的大作



家，身世富于传奇色彩，词作又脍炙人口，本来可以创作出相当感人的作品的，可惜没有达到。他说原因可能有多种，但和研究不够，体会不深有关吧。他说你是研究唐宋文学的，对辛弃疾也有研究，何妨在剧本方面一试，写好后我可以向荒煤同志推荐。我说我的科研任务很重，而且写论著和编辑剧本是两副笔墨，只能将来再说。

毛星同志“文化大革命”后除继续关注文艺理论外，还花了巨大的精力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考虑了国家的需要，是独具慧眼的。单从我国文学史事业角度来看，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从“五四”前夕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正式出版的文学史有好几百种，但除了零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写进文学史外，整个古代文学史中还是一片空白。甚至像《格萨尔》、《玛纳斯》这样的世界知名的长诗，都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有的仅据《诗经》没有长篇叙事诗，便推论我们的民族缺乏想象力，有的仅知外国有《荷马史诗》，而不知中国有更长的史诗。我从事文学史工作40余年，一直为中国文学史缺少少数民族文学部分而深感遗憾。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由于那时全国缺乏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基础，而不得不仍按传统的范围撰写。“文化大革命”前，编写众多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任务已提上日程，收集、翻译、整理、研究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成果非常可观，一些试写的少数民族文学史也陆续问世。“文化大革命”一来，工作都停顿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再写14卷本《中国文学史》时，仍不得不扼腕叹息，无法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纳入这部大书。从这个角度看，毛星同志晚年将精力投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奠定了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的基础，也为编写名符其实的《中国文学史》提供了条件。

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事业本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可惜毛星同志被病魔缠身无法参与了。临终前两年，他听我介绍我住家附近的紫竹院公园的竹石、溪涧、绿化之美，使他想起了故乡蜀中，他和贾经琪同志曾与我们夫妇约定选择一个春暖花开或天高气爽的日子同游紫竹院，谁知病情益重，竟不能如愿！每当我们漫步在幽篁、雪松、湖石道上的时候，总情不自禁地会忆起他，忆起他的人格魅力而久久不能忘怀。

（本文作者吴庚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汪向荣

■ 简 历

汪向荣（1920—2006），上海青浦县人，1920年生于上海。早年求学于日本京都大学，攻读东洋史。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单位工作。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是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近30年中，汪向荣潜心学术，辛勤耕耘，向学术界提供了10余部学术成果（包括专著、史料汇编、史料校注和译著等）。此外，还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力作《鉴真》、《清国聘雇日本人》、《古代の中国と日本》还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汪向荣的学术观点至今仍受到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学界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视。



矢志不移 执著追求

——记我国中日关系史家汪向荣先生 ◆ 徐建新

汪向荣先生是我国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中著名的学者之一。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余年中，汪先生潜心学术，辛勤耕耘，向学术界提供了10余部学术成果（包括专著、史料汇编、史料校注和译著等）。此外，还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他的学术专著至少有3部被翻译成日文出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汪先生的学术观点至今仍受到日本古代史和中日关系史学界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界的重视。

汪向荣先生1920年生于上海，祖籍是上海青浦县。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曾赴东瀛求学。在日本，他先是就读于东京的东亚学校（原名东京高等预备学校，秋瑾、鲁迅、周恩来、钱稻孙等人早年留日时都曾在该校学习）学习语言，其间得到该校创办人、教育家、对华友好人士松本龟次郎先生和早稻田第二高等学校教员实藤惠秀先生（二战后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文学博士）的关照。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在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矢野仁一、塚本善隆教授（二战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指导下，从事中日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京都大学是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的大本营。京都学派的学者重考据，重实证，有乾嘉之风。汪先生后来回顾说，他的治学方法受京都学派的影响很大。在日本学习期间，他写出了《中日交涉年表》和《中国人留日教育史》两书。前者1944年由北京中国公论社出版，后者没有出版，多年后他将其中的部分内容删定增补成册，即1988年出版的《日本教习》一书。

新中国成立后，汪向荣先生曾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单位工作。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综合室（即今天的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的前身）从事研究工作，1987年退休。2006年6月3日，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